

潮州歌册志 (连载)

□ (汕头) 郭马凤

一、概述

潮州歌册是流行于广东省东部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讲潮州话地区的一种用方音诵唱的民间说唱本子；港、澳、台和南洋群岛讲潮语的华侨华裔和福建南部讲闽南方言地区也颇流行；诵唱者主要是妇女。

潮州歌册是民间的通称，原来的刻本均称歌或歌文，个别也有称稗词、话文、说唱的。解放后新编出版的唱本，才印上潮州歌册的名称。闽南同一体裁的歌文，民间称为歌仔册、歌册，台湾也然。当代论述潮州歌册的学者多是潮汕人，均用潮州歌册这一词，它已成为专用名词。马来西亚潮籍学者萧遥天早于40年代末在汕头市编写《潮州戏剧音乐志》(稿)“唱歌册”条目中说：“稗词入潮州，唱为潮音，称歌册，清代乾嘉年间已很盛行。”1982年北京文献出版社出版上海学者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在《释“潮州歌”》文中，提议正名。文中说：“‘潮州歌’，有时候也叫‘潮州歌文’，也有人称为‘潮州俗曲’，但这都只是暂时假定的名称。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经我很多时间的探考，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些线索。总之，它既是流行于广东省旧潮州府属及附近地区，而且是用潮州语言写的富于区域性的民间叙事长歌，称之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或‘潮州俗曲’，本来都没有什么不可的。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虽属暂时假定，也必须有比较可靠的来源和根据。基于这个理由，那么称‘潮州歌’，‘潮州歌文’，比称‘潮州俗曲’较为妥当。因为‘潮州歌’和‘潮州歌文’的‘歌’和‘歌文’，在这些流传的潮州歌本中，都曾经大量地称用。……曾经把我所见的一百六十余种歌本中所用到的这种歌本的称谓记叙下来，最多的就是称‘歌’或‘歌文’，而例外也只偶有称‘话文’或‘稗词’的。……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称这些作品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当不至于犯‘名不副实’的毛病，而确然名副其实了”。谭先生是著名学者，他也知

道当代出版的这种唱本称‘潮州歌册’，而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同一类唱本——马毅友《铁锤颂》，封面也署“潮州歌”；《中国大百科全书·曲艺卷》的“潮州歌”，条目也就是“潮州歌册。”为多说并存，以利学术研究，本文辑录了上述资料 and 观点。一些名称的确定，往往经历一段很长时间。“潮州歌册”这一名称既已在民间长期通用，出版部门在出版这一类唱本也多称用，而且为与抒情与叙事结合，格式较为松散，句法较为自由的潮州歌谣相区别，本文用“潮州歌册”词目。

潮州歌册的体裁有二种：一种是传奇即故事体，叙述完整的故事，如《隋唐演义》、《乾隆游江南》、《孟丽君》、《苏六娘》等；一种是歌行体，皆短篇，没有完整的故事，多记述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的事物，如《戒赌歌》、《百花名》、《百鸟歌》、《百屏花灯》、《十二月歌》等。

潮州歌册新旧歌本，不论长短篇，都有未曾出版或佚遗者。本文所辑篇目，仅是已知成册成篇或传抄流行的主要部分，共有329种。长篇如《隋唐演义》74卷12册，4万五千句；《双鸚鵡》50卷10册，约8万句；《鸡爪山粉粒楼》53卷9册，《五虎平西》27卷7册，《双玉鱼》10集，都是二三十万字以上的巨制；短的是千几百行一册，还有些歌行体的百数十行的散篇散页。潮州歌册是一宗丰富的文学遗产。它在帮助平民百姓特别是妇女懂得一点历史知识、人情物理、识字、文娱和宣传教育等方面起过广泛的作用。因此，潮州歌册成为平民百姓生活的教科书、识字的课本、精神的乐园。反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生产建设内容的歌册，还曾经在革命和生产方面起宣传和鼓动的作用。潮州歌册不是历史著作，但所叙述的历史人物故事、公案故事、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也为历史和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资料，如清同治年间潮州总兵方耀办清乡积案，现在甚难找到历史档案，在《方耀办积案全歌》中，却提供了不少材料。另外，潮州歌册与潮剧、歌谣、民间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艺术在相互套用的同时，也起相互促进的作用。

潮州歌册产生的年代及其题材的来源，一般说，自潮剧形成为地方剧种即明代中期以后也应同时出现。它吸收本地民歌和戏曲的唱词的一些成分，改编宝卷、变文、陶真、话本、鼓词和各地方音弹词剧本，也据本地史事民间传闻创作歌文。由于早期版本佚失，史志不载，当代研究者多作推论，具体论述有差异，在其未有充分的实证论据以前，本文摘述各家论点，多说并存。

潮州歌册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数百部久经流传的本子，影响深广，但长期以来，史志不载，学者不论，直至民主革命时期才有人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宣传武器，于是出现了如《中华革命军缘起》、《绥婚配歌》、《中国历史歌》这类有明显政论性质的歌文；在以后的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彭湃歌》，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保卫大潮汕》、《鲁南会战》、《南澳光复记》，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乌狗曲》等印刷本或传抄本。但其文学地位未有人论及，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饶宗颐主编《潮州志》时，萧遥天负责编写《潮州戏剧音乐志》在述及潮州本土诸戏与民间艺术关系时有“唱歌册”的条目，作简要记载。《潮州志》未及收入该志稿印行，1957年该志稿作者在马来西亚以《民间戏剧丛考》为名出版该书。1985年重订并复名《潮州戏剧音乐志》由天风出版公司再版，潮州歌册在海内外渐为学者所知。新中国成立后，旧歌册以其思想内容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停止流通，但这一通俗形式的普及功能却为宣传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所重视，各个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和文艺创作学习班，都提及利用这一形式，有的县市还举行歌册创作座谈会或培训班，于是大量短篇歌册配合各个时期的宣传需要而出现。第一本配合宣传需要而出现的《土改歌册》，于1952年由中共潮安县委宣传部编印出版。此类歌册以后不断在报刊出现，有的还由出版社出版。196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还曾组织潮汕十多位作者到出版社编写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册十余部，不久，因“文革”到来而没有出版。在大量出现配合宣传任务的歌册的同时，50年代，也有些作者改编传统题材歌册，由出版社出版，主要根据公演剧本改编，计有《白蛇传》、《秦香莲》、《十五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陈三五娘》、《春香传》、《妙嫦追舟》、《合珠记》等10余部，多是宣传坚贞爱情的题材。神话题材则极少出现，因为在当时反迷信思潮的影响下，有些群众对神话与信神弄不清。1953年《工农兵》文艺半月刊第7本刊登了陈莫改编的神话歌册《张羽煮海》，编刊人在歌文前写了一段解释神话的来源及与迷信的区别，这篇神话的积极意义的话，但刊出后还是引起强烈的反响与讨论。编辑部收到许多来信，反对神话作品。有的说：“政府说无鬼无神，现在《工农兵》说有海龙王、法宝。”“真荒唐呀，海水怎么能煮滚？！”“现在还在说海龙王鬼话”，“这是无影无迹的故事”，“是迷信的东西”，“张羽为了自己的婚事，放弃工作”，“损害了大多数的利益”。在来稿中，也有的肯定此类神话作品的积极意义。《工农兵》连续二期发表不同意见的

讨论文章，最后发表张菁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对群众进行一次神话与迷信相区别的教育。农民本来很迷信、由于缺乏基本知识，在反迷信运动之后，却反过来将健康的神话误为迷信。由于歌册的听唱者主要是这类人，所以报刊和出版社，当时对神话题材的刊发，持慎重态度。旧歌册有不少神话或夹杂神话的题材，确也不少宣扬迷信、宿命的因素，不容易清理，这也是歌册停止流通和未便整理的原因。

旧歌册的收藏整理，文化部门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出版的一些传统题材歌册，多是改编者由于自己的爱好根据公演剧本改编。1956年，居北京的潮籍俗文学家薛汕南下搜求俗文学版本，在他的敦促下，潮州歌册最大的一家刻印商李万利翻印一百多部发售，并为几家大专院校和图书馆收藏。汕头古旧书店也有少量流通。196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潮州歌册，也没有提出整理潮州歌册。一直至8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和潮汕地区有几位学者开始研究潮州歌册时，薛汕着手整理潮州歌册。他选取《宋帝昺走国》等9部不同题材的版本进行轻度整理，取名《潮州歌册选集》，分上下二册，于1992年由汕头市群众艺术馆编印作为内部流通的读物。由薛汕提供版本的旧歌册137部（378册），也同时由该馆誊印，提供有关部门收藏。至此作为一宗文学遗产的潮州歌册的一部分得以保留下来。其余一些散存民间的版本则仍待有人去搜求。

对潮州歌册的研究，是学者零散进行的。萧遥天到在40年代编著《潮州戏剧音乐志》中的“唱歌册”条目，对歌册的源流、特点、体裁、歌本作了简要的分述，这是学者研究的开始。50年代薛汕在搜求旧歌册版本的同时，已接触了歌册的一些问题，但未见有论述的文章。60年代初，马凤对旧版潮州歌册进行一次调查，写了《旧潮州歌册版本调查杂记》（附目录内容简介）和《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并在一些创作学习班上讲过。1963年唱潮州歌的能手和作者萧菲（女）在澄海县潮州歌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写歌册的体会》。这些算是较早接触歌册的学术和艺术问题的，但还不是对潮州歌册进行总体研究。80年代初，上海著名学者谭正璧及其女儿谭寻出版了《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2），其中“潮州歌”部分，对其所见162部歌册的版本卷数、出版商号、内容作了介绍并有所考证，有《释“潮州歌”》文，对“潮州歌”（册）的名称，作者与写作年代、题材的来源、情节与人物、潮州歌

与潮州戏的关系作考释阐述，全文14万言。这是比较系统介绍评述潮州歌册的著作。1985年，薛汕出版他的专著《书曲散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书中《板曲九种》有“潮州歌册”专文，对其名称、源流、艺术形式、歌本、作者作了介绍。在同一时间前后，在潮汕本土有几位文化人也在省内外一些书刊上发表了论述潮州歌册的文章和辞书条目。如马凤的《潮州歌册——一宗丰富的俗文学遗产》（见《潮州文化丛谈》新加坡版）、林有铤的《潮州讲唱文学初探》（见《潮州民间文学浅论》），陈覓、郭华为《中国曲艺曲种辞典》所写的“潮州歌册”条目，吴奎信的《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本地报刊也曾有些零散文章探讨歌册的一些问题。至此，潮州歌册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曲艺品种才记入史册，并进入学者的视野。

潮州歌册的营印出版者，五十年代以前都是民间商号。大都在潮州市，汕头也有一些。据潮州一些出版商号后代人的忆述，营印最多最久的是李万利，约创于清咸丰至同治年间（1851—1874）。李万利原是杂货店，后来才营印歌册等通俗书刊。李万利后来又分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李万利和王生记合店）。除上述商号，还有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王友芝堂等也营印歌册。这些商号多创设于清末。其后，多家的商号的版本大多被李万利收购，挖去原版的刻书商号，改用李万利字号出版，一直至五十年代，民国以后，汕头升平路的名利轩和马合利，都曾营印歌册。民国初年以前的歌册都是木刻本，接着才有石印本和铅印本。以王生记和汕头的名利轩就曾用三号宋体铅字模营印了友芝堂藏版的《双鸚鵡》五十册共2000部以及《新中华革命军缘起》等。名利轩还曾于民国癸亥（十二年）营印潮属双凤集文社捐题印送的潮阳佛教信徒陈觉梦所撰潮州歌册《目莲救母经》（全部三卷）。上述商号，除营印歌册，也兼营印贩卖潮剧曲册和外地弹词，如俗所谓“广歌”的广州木鱼《花笺记》《二荷花史》和南音《再生缘》等。

新中国成立后，新编歌册除在报刊和有线广播演播出版外，多由国家出版社如广州的南方通俗，广东人民等出版社以及本地方的宣传文化部门编印出版。用录音带形式出版发行的仅有1992年汕头海洋音像出版社录制的《苏六娘》十回二盒。（待续）